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启迪

——基于“两个结合”的视域

许加彪^{1,2}, 胡锦涛²

(1.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2.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延安时期,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信息“封锁”和“污化”传播,准确阐明党的方针和政策,展现真实的党的形象,积极争取更多的外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对外话语传播策略。党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共不仅通过各种出版物和广播向国内外宣传自身的政策和成就,还积极邀请外国记者和学者访问延安,以其亲身经历,客观报道延安的真实情况。通过这些对外传播手段,中共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信息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 对外宣传;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5-0016-08

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从而更好地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延安时期,国民党在新闻领域实行独裁统治,中共为向国际社会传递真实声音,采取多种策略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中共通过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民主自由”“爱国主义”“廉洁奉公”的政党形象,让国际社会如实了解其政治本色。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原因、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从“两个结合”的视域,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进行探析。这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中共如何成功应对外部挑战,还为今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借鉴,助力新时代中国更好地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缘由

延安时期,国内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信息和相关政策了解十分匮乏。当时,中国共产党综合实力较为薄弱,加之国民党多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活动,停发军费,控制经济发展,造成了共产党开展正常工作的种种困难。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中共不仅可以向外界传达其真实的政策和理念,还能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报道,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共在延安时期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利用各种渠道,包括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出版英文刊物、创办广播电台等,向世界展示其在革命斗争中的成就和决心。这一系列对外宣传活动,不仅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也为其争取到宝贵的国际援助,助力其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目标。

(一) 打破国民党“封锁”和“污化”的迫切需要

国民党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思想,实施了严密的新闻监管措施,尤其针对中共的新闻出版领域,采取

了原稿件审核政策, 以此来控制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话语权和国际形象的建构, 进而实现其对国内的独裁统治。1938年7月, 国民党颁布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 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之言论均为反动言论”^[1]。此后, 国民党严加监管和取缔有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相关组织和机构。1939年6月, 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战时新闻检查局”。各省市也相继成立新闻检查所, 进行图书杂志和新闻检查, 形成了对新闻领域的网格化严密把控。1947年2月28日清晨, 国民党当局出动2000多名军警, 包围重庆《新华日报社》, 迫使该报停刊。这些法令规定了新闻言论及思想需契合国民党主导意识形态, 要求所有新闻出版物需历经严格审查流程, 为国民党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封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纸、广播等媒体是政党的“喉舌”, 是让国际社会了解其真实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基本途径。延安时期, 国民党在新闻领域实行“独裁统治”, 中共在国统区和境外缺乏有效的“发声筒”, 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被国民党错误引导, 形成了对中共的错误认知。国民党的顽固派报道中将中共称为“土匪”和“亡命徒”, 从而在国际形象塑造中对共产党进行了“污化”。1941年1月中旬, 国民党颠倒是非, 污蔑新四军“叛变”, 称新四军为“叛军”, 以此达到反共反民主的目的。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颇为“丰富”, 所以国际社会大多依赖这种途径来获取相关信息, 难以深入实地了解中共的真实状况, 只能接受被国民党“污化”的形象。因此, 中共迫切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向世界传递真实的共产党声音。

(二) 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救援的迫切需要

在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 中共的力量相对薄弱, 迫切需要国外的援助以增强其实力, 扩大其影响力。该时期, 中共不仅要应对军事与经济层面的严峻考验, 还需直面国际形象受损的困境, 故而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显得尤为关键。1937年11月29日, 朱德总司令向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致信, 详述八路军遭遇的重重困难。信中阐述: 八路军在全力投入抗日斗争的过程中, 尤其在医药资源与医疗设备方面需求紧迫, 急切盼望获得医药补给、外科手术器械及专业医师的协助。对此, 尼赫鲁及印度国民大会党积极响应。1938年9月1日, 5名印度医生携带超过60箱药物及若干医疗设备抵华, 投身援华医疗救助活动。这批援助及时缓解了八路军的迫切需求, 同时也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通过主动开展对外宣传工作, 中共有效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包括国际红十字会、美国援华医疗队等机构在医疗卫生、军事装备及经济资源上的广泛援助。这些外部援助不仅显著增强了中共的综合实力, 也为中共在国际舞台塑造了正面形象, 有助于中共赢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三) 积极争取实现民族解放的现实考量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的侵华战争是对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公然挑衅。在此紧要关头, 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及推动内部政经发展的迫切需求, 鼓舞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中国共产党在对敌宣传战线上展开了大量攻势, 旨在削弱敌人士气, 从而加速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进程。1937年10月9日, 《解放》杂志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告日本陆海空士兵书》。文中激昂陈词: “日本士兵们! 起来吧! 倒转枪来吧! 打倒压迫你们的日本军阀, 与中国的工农弟兄们团结起来!”^[2] 此番呼吁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同时力图唤醒士兵们的良知, 使他们意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 并促其加入到反抗共同敌人的行列中。抗战期间, 中共在前线采取多种形式, 如分发传单、张贴标语及广播宣传等, 广泛向日军传播反战信息, 揭露军国主义的暴行, 召唤日本士兵弃战从善。^[3] 为进一步扩大反战宣传的效应, 1941年12月3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增设日语播音的形式, 该电台不仅详尽揭露了日军侵华的残忍行径, 还详述了中共的政策方针, 力劝日本士兵觉醒, 反对无谓的战争。中共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反战宣传活动, 显著削弱了侵略者的斗志, 破坏了其军事力量。这些宣传不仅令众多日本士兵直面战争的惨痛与残酷, 还激发了他们对战争本质的反思, 萌生厌战心理, 甚至促

成部分士兵投诚。反战宣传的胜利,为中国的抗日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也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最终实现铺平了道路。

二、延安时期中共对外话语体系传播策略叙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污化”,中共采取了多种对外交流与沟通的方式,使国际社会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理解和信任,还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内部建构

1. “走出去”: 设立外宣机构

1936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办事处内建立了外交部。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并在交际处下设总务科、招待科和联络科。机构拥有15孔窑洞和35间平房,内部设有礼堂、餐厅和会客厅等设施。^[4]从1938年至1941年的三年时间里,一共接待了7000余名中外友人,成为中共中央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939年1月16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国际政党和组织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并向各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局不断壮大党的队伍,从而增强了中共的影响力。^[5]同时,南方局在香港开设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其他海外民主人士、国际组织和海外侨胞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接触。^[6]通过这些对外交往活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污化”,让国际社会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方针。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信任,还为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事业赢得了宝贵的国际支持。

2. “走出去”: 积极创办报刊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着手创办了多样化的对外报刊。这些报刊成为向世界展示其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关键渠道。通过这些报刊,中共持续向海外传递其政策导向与法律法规信息,显著促进了国际舞台上中共正面形象的构建。《新中华报》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影响,诸多外国政党借此报刊深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政策、理念以及革命根据地的真实面貌。该报的新闻报道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国际形象的建立,促使国际社会对其更为全面且客观的认知。1941年3月,《中国通讯》于延安问世。这是中共在国内首次发行外文宣传的杂志,涉及英语、俄语及法语版本。这份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专业化与国际化升级,为国际社会直接洞悉党的政策立场提供了便捷,加深了外界对中共的信任与拥护。此外,延安时期在海外还发行了一系列报刊,诸如《先锋报》《全民月刊》及《救国时报》等。它们致力于传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国际战争的见解,吸引了众多国际政党及外国记者的密切关注。通过这些报刊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构建了深远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了其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

3. “走出去”: 创建对外广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0年底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一个全新纪元的诞生。在此之前,党的新闻事业主要依托于报业与通讯社的力量,而无线电广播技术的接入,则为信息传播的途径带来了显著的扩展。1941年12月3日,该电台推出了日语广播栏目。其内容主要源自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维持每周五一次的频率,每次持续半小时。这一举动不仅是我国对外广播事业的雏形显现,也彰显了中共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创新精神与积极作为。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英语广播正式启动。目标受众直指海外,侧重介绍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行动及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情况等。^[7]通过这些对外广播的传播,中共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垒,使党的实际真实情况与抗战方针得以向国际社会传播。这样的国际传播战略,不仅助力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积极的形象,亦增强了其国际话语体系中的

影响力。

4. “走出去”: 参加国际会议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期间,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与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定大会。在参会期间,董必武积极参加小组讨论并公开演讲、出席新闻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些举措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在抗战期间所扮演角色及其领导能力的认识,从而获得了高度的赞扬与认可。董必武在该会议上的杰出表现为中共在全球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尊重,有效提升了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共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建构。参与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不仅是中共首次踏上国际重大事务的实践舞台,也成为展现其政治理念与实践成果的宝贵契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地位,为后续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外部建构

1. 将外国记者“请进来”,发挥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桥梁作用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冲破重重阻碍,历尽艰难险阻,成功到达延安。他成为首位踏足延安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赢得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与重视。通过亲赴现场的调研与采访,斯诺获得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红色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新闻报道、出版著作等方式,向外界传达了关于中共真实面貌的信息。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Nym Wales)谈话,回答她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主与自由等问题的见解。这个谈话后转载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并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2](148)}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参观团并接受采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建立以人民为中心、民主自由的主张。1944年7月至8月,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John Service)通过深入部队进行细致访谈,对八路军的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有了直接的了解,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他认为中共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是中共深知广大农民的疾苦,本着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进行武装革命,有了这样广大的民众基础,共产党是不会被消灭的。^[8] 这些外国记者通过实地调研和采访后,写下了许多著作,全面、客观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传递给全世界。

2. 发动海外华侨的力量,推动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人组建了众多抗日援国组织,并着力创办华文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在揭发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及分裂图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丰富详尽的报道与深刻透彻的剖析,它们成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赢得了国际团体及全球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各国的华侨救亡团体纷纷组织爱国人士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情况。其中,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是第一个将东南亚华侨利益与祖国命运紧密结合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来到延安进行参观访问,亲眼目睹了边区人民的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在南桥筹赈组织召开的万人欢迎会上,激动地向华侨同胞们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描述道:“延安城内颇繁荣,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4](133)} 陈嘉庚的演讲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建设成就,还通过其个人的声望和影响力,使更多的海外华侨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陈嘉庚的演说在海外华人圈中引发了深刻的回响,他借助亲身经历与真挚情愫的传达,增强了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

拥护。在此积极倡导之下,海外华人愈发热忱地参与到援助抗战的行动中,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伟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种超越国界的信息传播与动员战略,不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定位,也促使众多国家及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局势形成了更为客观、真实的理解。来自海外华人的援助及国际社会的紧密关注,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并在构建中国共产党正面的国际形象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两个结合”视域下的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探析

“两个结合”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延安时期党的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延安时期,中共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内容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民主自由”“爱国主义”“廉洁奉公”的政党形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的“人民性”

马克思的“人民性”理论为延安时期中共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源泉。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得不打破旧的国家机器,要获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形成一种合力。若没有这种合力,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立都成为沉痛悲剧。”^[9]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也强调:“分配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力,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就是人的因素;分配的真正目的是使人民能够占有一定社会资料。”^[10]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践中不断融入中国具体国情,开拓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路径。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共逐渐探索出,只有团结广大农民、工人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美军观察团成员谢伟思基于对延安的亲历考察与访谈,指出:“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要想取得抗战的胜利,就需要充分动员人民,这就要求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给予他们政治权利,并进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经济、政策改版。”在他看来,中共军队之所以能展现出强大的战斗能力,原因在于中共深切理解农民的困苦,能够从农民的视角出发,用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激励他们武装起来,共同对抗剥削与侵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征途中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国情的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地践行人民至上的原则。通过凝聚广大民众的力量,中共在国内赢得坚实的基础,并经由外国友人及媒体的国际传播渠道,树立了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党形象。这一国际传播策略不仅增强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重,也为其引来更多海外援助与支持。这些广泛的国际援助不仅在物质层面助力了中国对抗日战争的投入,同时在精神领域及国际舆论环境中,为中国共产党博得了更广泛的理解与认同。历经持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验证,中共在延安时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构建出一套系统化的对外话语体系。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注重在革命实践中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给养。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构建的“爱国主义”形象,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忠君报国”“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等观念紧密相联,这些理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的形成提供了养分。历史上,不乏借由诗词抒发个人报国情怀与坚定信念的英才。唐代诗人岑参在其作品《送人赴安西》中的“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彰显了淡泊个人名利,将国家与民众利益置于首位的精神境界。清朝徐锡麟的《出塞》云:“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该诗体现了作者甘愿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展现了将战场牺牲视为最高荣誉的价值观,激励后续众多爱国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传世佳句,展现了其面对生死考验,仍坚守忠诚,誓死捍卫国

家的崇高精神。此等气节不仅贯穿其一生,亦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灯塔。回溯至延安时期,对外宣传工作是中共强化国际形象构建的关键举措,旨在通过多元渠道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客观的中共形象,对外宣传包括自主发声和借助海外新闻媒体发声。延安时期,中共邀请了许多国际组织、外国记者、海外侨胞等来延安实地调研、采访,借助他们的力量将中共的真实声音传播给国际社会。斯诺通过长时间在延安的生活和采访,将所见所闻陆续写出了《复始之旅》《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等世界名著,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他的书正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中共还安排外国记者赴前线考察,通过实地调研和采访,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共抗战的新闻报道、通讯。如《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军民合作目击记》等,客观报道了中共的抗战、团结、民主理念,彰显了延安时期中共抗战爱国的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共在战争中的正面作用。

(三) 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与“两个结合”

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的“民主自由”政党形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指出:“只有民主制的国家制度才能更好地造福人类,服务人民。民主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个体成为自由的主体,当然,使每个个体都能成为自由的主体,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1]在通过开展对外宣传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倡导民主自由,不断解决中国革命事业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要放开他们到处跑,凡来边区的客人,不管其政治态度怎样,什么地方都让他们看,包括监狱,客人自由行动,这样做的效果很好。”^{[4](129)}外国友人在访问延安和边区返回后,给予了热情的称赞。远东权威学者毕尔氏说:“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

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的“廉洁奉公”的政党形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具体运用到对外宣传及国际形象建构中。有的外宾说:“边区政府继承了‘成由勤俭破由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事雷厉风行,惜时如金,已成为边区党政、工作人员的风尚。”^[12]外国友人通过自己的报道和著作将客观真实的政党形象展现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真实地了解我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舜帝以身作则并教育后人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晏婴把廉洁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并指出“廉者,政之本也”,管仲把廉与德作为支撑国家兴盛的支柱,并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就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如何防治贪污腐化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深刻地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并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了意蕴深刻的廉洁文化理论指导和对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形成了对外话语体系传播内容中的“廉洁奉公”的政党形象。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当代启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对我们今天立足于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今,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外宣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专业性人才,同时积极开展自主对外宣传,发挥好“海外媒介”的桥梁作用,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

(一) 培养专业人才,提高对外宣传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13]这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着力打造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

创新研讨班、宣传思想干部增强“四力”培训班、文艺业务骨干培训班等品牌培训项目，进一步提升宣传队伍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这些培训项目不仅注重理论学习，还强调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使宣传人员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游刃有余。同时，加强人才工作制度建设，开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培养工作，采取培训研讨、考察采风、实践锻炼、课题资助等多种方式，对入选人才予以重点培养和资助。^{[2](770)} 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实践锻炼，这些青年英才将成为新时代对外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将大幅度提升我国对外宣传的水平和效果。总结延安时期对外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立足于新时代，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对外宣传队伍，才能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有利地位，有效传播中国声音，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积极开展自主对外宣传，引导正面舆论

对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国民党控制了大部分的传媒资源和发声平台，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受到严重扭曲。面对此番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对外广播、设立外宣机构、参加国际会议、发行《先锋报》《华商报》《救国时报》对外宣传报刊等渠道，积极开拓自主对外宣传渠道，向世界传播其真实声音和理念，从而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话语权的重要性。他指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新兴媒体的作用，以增强中国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14] 这些理论观点与实践举措，继承和发展了延安时期对外宣传的精神和经验，为当代中国在全球舞台的形象构建赋予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导向。习近平的著作《谈治国理政》和《摆脱贫困》，在中文原著的基础上，被广泛译成多种语言并向全球发行，深刻展现了中国在国家治理与脱贫领域的政策导向与实践成果。这一全球化的传播策略不仅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内外政策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借鉴中国经验提供了实质性的参考与启示。通过自主开展的对外传播工作，不仅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与科技发展的新成就，还为国际社会搭建了一座客观、全面洞察中国的桥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发挥好“海外媒介”的桥梁作用

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善于利用“海外媒介”的力量进行宣传和报道，是获得国际社会深入了解与认同、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意识到这一点，积极通过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著作向国际社会传递真实的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为塑造中国共产党“廉洁奉公”“爱国主义”“自由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我国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都会举行“总理答记者”问环节。这种面向全球的新闻发布会，正是我们利用“海外媒介”发声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此方式，国际社会能更真切、全面地洞悉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政策导向及政府立场。这种高透明度的沟通模式有利于消除部分国际社会的误解与偏颇看法，增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信誉与形象建构。此外，应充分利用海外华人媒体与团体的力量。他们作为党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宝贵资源，利用地理优势，能够代表中国发声，促进中外的互动，加深双方的认知与信赖。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的声音能够更加深入和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一个多元化、真实的视角。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对我们今天立足于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外宣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懂外语、熟悉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性人才。经过系统化的教育培训及实际操作锤炼，这批专业人士将成长为代表新时代的对外传播主力军，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声注入强劲动力。此外，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宣传活动，诚挚邀请海外媒体访问中国进行实地采访

与报道，以传递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与政策导向。通过这些举措，我们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的真实面貌，还展露了国家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蓝图，为构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回顾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能通过高效的对外宣传工作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这对我们在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唯有不断创新对外传播的策略与方法，培育高水平的国际传播人才，方能更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真实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刘哲民. 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 [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47.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1.

[3] 赵新利.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再研究——基于日本馆藏档案的考察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7）：96-110.

[4] 雷云峰. 陕甘宁边区史 [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128.

[5] 涂凌波，张天放. 延安时期中共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阶段、机制与观念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12）：104-120.

[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84.

[7] 刘晓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力建构 [J]. 编辑之友，2019（5）：93-99.

[8] 柳斌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成功经验 [J]. 新闻春秋，2021（5）：3-8.

[9] 杨须爱.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J]. 学术界，2020（12）：112-121.

[10] 寇清杰，肖影慧.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J]. 思想战线，2024（1）：98-108.

[11] 李龙，凌彦君.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源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解读 [J]. 理论月刊，2015（3）：27-32.

[12] 田建伟. 延安时期陈云党风廉政建设思想述论 [J]. 思想教育研究，2016（12）：26-29.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N]. 人民日报，2021-6-2（01）.

[1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N]. 人民日报，2014-1-1（01）.

[责任编辑：高辛凡]